

編 序

《蕃族調查報告書》是大約一百年前，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補助委員佐山融吉深入臺灣山區部落，實地訪談族人和當地日本警察，採用日文片假名記音，日文平假名、漢字書寫，並加上照片、地圖與手繪插圖，有系統地撰寫而成的一套八冊之原住民調查報告書。本冊原書名為《蕃族調查報告書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由於現今臺灣原住民族行政單位將過去文獻常見的「曹族」改稱為「鄒族」，又根據該套書各冊出版年代順序，因此本書以《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作為中文譯本之書名。

根據筆者考證，「曹族」這個名稱，最早應該是出現在本書中。在此書之前的日文著作，大多採取片假名記音。而根據董同龢（Tung 1964:1）所著之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以及陳奇祿（1981:37）撰寫的《民族與文化》兩書指出，「曹族」一詞應該是譯自居住在阿里山一帶自稱為 **Cou** 的一群人之自稱。早期調查者將 **Cou** 以 **Holo** 話發音而譯成漢字的「曹」，後來學者改採國語發音，因而譯作漢字的「鄒」。由此可知，日本與臺灣研究者之著述，不論是使用「曹族」或「鄒族」此一族稱，其實所指的都是同一群人。

然而，事實上，不論是「曹族」或今日所改稱的「鄒族」，其族名稱呼與族群分類建構歷程可以說十分複雜，而且與日本總督府蕃族調查有著密切關係。很顯然地，當時總督府進行蕃族調查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原住民地區行政架構，以便採行更深入、更有效的手段實行殖民統治。儘管佐山融吉承認因為雨季和繳槍等因素影響，使得調查成果不夠周全，但這本調查報告書仍可說是最早較有系統的「曹族」與「鄒族」社會文化調查資料，值得後繼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以「曹族」或「鄒族」此一族群命名及其涵蓋的人群範疇為例，若仔細追溯命名之初一直到現在，歷經多次更名與正名，可以看到「曹族」或「鄒族」族群分類與定位的複雜歷程。詳細而言，筆者主張，追溯「曹族」或「鄒族」族群名稱的源起和建構過程可以看出，試圖迎頭趕上歐洲與美國等老牌殖民帝國的日本，如何在二十世紀初期，試圖採用人口調查（**census**）將剛納入其殖民統治體制的臺灣原住民有系統地

納編入國家體制內。筆者認為，這種作法正如 Benedict Anderson 在他透過跨文化與跨時限比較研究所撰寫的經典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指出，由於人口調查是近代殖民國家重要權力制度（institution of power）之一，它深刻地影響亞非殖民地政府想像其領地中被統治人群之性質。透過制度化的過程，殖民地政府還進一步將這種想像逐漸轉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因而形塑人民對自我集體身份與族屬的認知（Anderson 1991[1983]）。¹ 為了提供讀者深入閱讀之重要脈絡，筆者將在本編序中主要針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曹族」與「鄒族」族名之分類體系，以及其在臺灣原住民族分類體系中的位置進行精要討論。

有些學者或官員習慣將「鄒族」區分成「北鄒」和「南鄒」，名為「北鄒」（或「阿里山鄒族」）的這群人，也就是本調查報告書所說的「阿里山蕃」，族語自稱 Cou，中文記為「曹」或「鄒」，其含意為「人」；至於被稱為「南鄒」的這群人，則是由自稱 Hla'alua 和 Kanakanavu 的兩群人所共同組成，也就是本調查報告書所說的「四社蕃」和「簡仔霧蕃」。Hla'alua 僅知為族人自稱，其原意不明，Kanakanavu 的涵義為居住在 Kanakanavu 一地的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鄒族」原本並沒有一個統稱全族的族名，如今所通用的族名，事實上是日本殖民政府官員與學者為了族群分類與統治上的需要，才開始採用「北鄒」語中指稱「人」的字——“Cou”作為統稱這三群的族名。換句話說，“Cou”、「曹族」或「鄒族」這些族群名稱是由官員和學者率先命名，之後透過行政體系與學術體系的應用，才逐漸為行政機關與族人們普遍使用而成為族名。

詳細來說，1911 年之前，日本殖民政府進行人口調查時所採行的「生蕃」族群分類大多採用九族說的分類法，即 Atayal、Saisiat、Bunun、Cou、Tsarisien、Paiwan、Puyuma、Ami 及 Yami，但自 1912 年起，則普遍採用 Atayal、Saisiat、Bunun、Cou、Paiwan、Ami 及 Yami 等七族說的分類法（王人英 1967:4–7；芮逸夫 1972[1952]:524–525）。除了上述九族說與七族說這兩種官方人口資料所採用的分類系統之外，日本殖民時期，語言學和人類學學界中尚有多種由不同學者根據語言、風俗習慣、物質文化與族群起源等各種分類原則所提出來的分類系統（芮逸夫 1972[1952]；衛惠林 1973 [1956]；陳茂泰 1994:84–87）。

1 關於從荷蘭人統治臺灣以來的「曹族」與「鄒族」族群分類與認同議題之詳細討論，見林曜同 2005, 2007, 2009, 2010a, 2010b。

儘管這些分類系統彼此間有程度不同的差異，但是，筆者認為，由於這是臺灣原住民第一次整體被納入外來統治者所建立的「全面性分類架構」(a totalizing classificatory grid)，因此其涵意特別值得重視。Anderson 強調，人口調查之所以成為近代殖民國家重要的權力制度之一，關鍵在於它讓殖民政府得以將一個「全面性分類架構」加諸於領土之上，迫使所有人都能納進其統治架構中。換言之，透過人口調查對殖民領地中的人口，有系統地進行分類與量化，殖民政府將領地內眾多陌生人群轉換為可歸類、辨識與計量的群體，因此得以將他們逐步納入國家行政體系當中（1991[1983]: 163–170, 184）。

也就是說，透過人口調查進行有系統的族群分類之後，臺灣原住民不再僅僅是過往的統治者眼中散居各地的部落，也不再只是依照與殖民政權之間的關係來進行差別待遇的人群，而是可以辨識、分類與統計的人群組合。這種經由所謂「科學式」分類架構所建構出來的族群分類，透過官方文書（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各族報告書）及其他文獻（如，移川子之藏等 [1935] 的人類學著作）等印刷品的發行，逐漸成為殖民政府想像其領地的方式之一。在日本殖民政府離開後，這樣的想像方式並沒有停止作用，反而是繼續成為行政機關與學術界想像及理解臺灣原住民的重要依據。這從國民政府來臺之後，以日本官方的七族分類法為基礎，再將其中的 Paiwan 分開成 Paiwan、Rukai、Puyuma 三族，繼而建立一直沿用到 2001 年為止的臺灣原住民九族分類法的作法，就可以看出統治政權前後採用的族群分類系統之間的「系譜關係」了（林曜同 2007:82）。

換言之，日本官方或派出舊慣調查會的官員深入山區調查，或聘用學術社群的成員（如，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的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建構出其族群分類體系。而這種分類體系又透過研究成果回饋到官方體系當中，成為後繼學者與統治者進行學術研究、人口調查，乃至於治理的基本依據。換言之，殖民政府人口調查所採用的族群分類法，不僅成為行政當局用來想像及架構其統治措施之依據，甚至透過官方與學術脈絡（例如，官方與學術印刷品及日本人類學者）傳承給下一代的統治政權與學術系統。值得重視的是，由於這是「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研究者」而非「被研究者」所用來分類、理解與想像「他者」(others) 而非「我群」的方式，因此這套族群分類架構在應用過程中，逐漸以外力介入的方式對於被分類的原住民造成深遠影響（林曜同 2007:83）。

然而，這樣的族群定位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更非學術定見。筆者反覆檢視歷年來的「鄒族」相關文獻後發現，對於日治時代以來嘗試對臺灣原住民進行系統分類的研

究者或殖民官員而言，「鄒族」族群分類與定位一直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對於分居三地且語言與社會組織有著明顯差異的人群，究竟應該同屬於「鄒族」，抑或應各自獨立成三族群，學者們與行政官員的族屬論述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綜合語言學者、人類學者、博物學者與行政官員等各類專家學者所建構的分類系統，計有「單族群說」、「兩族群說」和「三族群說」等三類，² 以下將依論點提出年代的先後順序進行討論：³

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1900）所著的《臺灣蕃人事情》，是最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系統分類的專門著作之一。根據語言與風俗習慣異同，他們將「鄒族」視為單一族群，是未「漢化」的原住民七個族群之一（馬淵東一 1954:3）。⁴ 由於他們列舉「鄒族」十個大社（包含三十九小社）的組織，而不分群（衛惠林 1950:1），筆者認為這屬於「單族群說」中的「不分亞群說」。

博物暨人類學者鳥居龍藏在 1910 年綜合語言、體質與習俗的研究，將臺灣原住民族群區分成九族，⁵ 其中將 Niitaka（即「鄒族」），內分為 Kanakanavu、Hla'alua 及 Cou 三群（Torii 1910，轉引自鹿野忠雄 1955[1941]）。佐山融吉在 1913–1921 年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中，依物質文化和生活習慣之異同將「蕃族」分為八族，⁶ 「曹族」為其中一族。在 1915 年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中，他將「曹族」內分為阿里山蕃、四社蕃與簡仔霧蕃三群，也就是 Cou、Hla'alua 與 Kanakanavu，這是「單族群說」中的「三亞群說」。

至於總督府官員小島由道、河野喜六、安原信三與小林保祥在 1915 年至 1922 年間出版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根據風俗習慣異同而將「番族」區分為八族，⁷ 「鄒族」是其中一族，並且是由 Cou、Hla'alua、Kanakanavu 和 Takopulang 四群所組成的族群。位於阿里山區的 Takopulang 首次也被含括進「鄒族」，是此分類系統

2 「單族群說」又可細分成「不分亞群說」、「南北兩亞群權宜說」、「三亞群說」、與「四亞群說」等四種說法。

3 詳細討論見林曜同（2007）。

4 這七個族群是 Atayal、Vonum（含半漢化的 Sau）、Coo、Tsarisen、Supaywan、Puyuma 和 Ami。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1900）將漢化的平埔族區分出 Kuvarawan、Kataganan、Taokas（包含 Saisett）、Arikun、Vupuran、Pazzehe、Poavosa、Lloa、Siraya 和 Makatao 等十小群。

5 此九族為 Taiyal、Niitaka、Bounoun、Saou、Tsarisen、Paiwan、Pyouma、Ami 和 Yami（Torii 1910；引自鹿野忠雄 1955[1941]:121–123）。

6 這八族為大么、紗績、曹、排灣、獅設、武崙、阿眉、及卑南等八族（佐山融吉 1913–1921）。

7 這八族為 Atayal、Saisiat、Bunun、Cou、Rukai、Paiwan、Panapanayan、Pangtsah 和 Yami（小島由道等 1915–1922）。

的一大特色，⁸ 此為「單族群說」中的「四亞群說」。

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及馬淵東一（1935）則根據族群起源與氏族歷史確認了九個族群，⁹ 其中將 Cou 視為單一族群，並因彼此相異程度之多寡而分成「北 Cou」與「南 Cou」兩亞群。「北 Cou」是指阿里山 Cou 四大社，「南 Cou」則包括 Kananavu 和 Hla'alua。不過，他們同時也強調，南 Cou 與北 Cou 之間的差異相當明顯，在將來的研究中或者有必要將兩者各自分成獨立的族群。此為「單族群說」中的「南北兩亞群權宜說」。

語言學者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在 1935 年出版的《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中，由比較語言學的觀點，將 Cou、Hla'alua 與 Kananavu 三群並列，認為皆擁有獨立族群的地位。筆者認為，這應該可以說是「三族群說」（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至於語言學者淺井惠倫（Asai）在 1936 年提出「兩族群說」。他將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分成五個群，其中 Cou-Paiwan Group 自成一群，其內再分成四亞群：Hla'alua-Kananavu、Cou Original、Original Paiwan 及 Original Rukai（轉引自衛惠林 1950:1；劉斌雄 1969:67-69）。

以上這些「鄒族」的族群定位與分類方式，不論是「單族群說」、「兩族群說」、和「三族群說」，基本上都反映了研究者特定的理論立場。這裡可以看到殖民學術社群與全球社群之間的關係，以及全球社群與日本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進行殖民地「蕃族」／「番族」研究之學者，包括語言學者、人類學者、博物學者和官員等人，已經開始受到全球社群的影響，透過留學歐美與研讀人類學著作，研究者獲得分類所依據之語言學與人類學等理論基礎，例如：移川子之藏就是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專家。因此，可以說此時全球社群已經影響到殖民地的學術社群，這套殖民帝國的殖民地管理制度事實上也在國際間彼此交流著。

由於研究者各自選取特定的社會文化特質（如，風俗習慣、族群起源與氏族歷史、物質文化、體質特徵或語言等），試圖針對各方面都有相當異質性的幾個群體進行認定與區辨，因而產生相異的族群分類與定位。這些問題突顯了兩個現象，首先，過去民族誌研究對象的人群分類與定位，往往是研究者個人以所謂「客觀」標準進行

8 如小島由道（1918）《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

9 這九個族群為 Atayal、Saisiat、Bunun、Cou、Rukai（即之前所稱之 Tsarisen 的北部與東北部）、Paiwan、Panapanayan（即之前所稱之 Puyuma）、Pangtsah（即 Ami）和 Yami 等九族（移川子之藏等 1935；馬淵東一 1954:2；另見王美青 2003:17）。

分類與認定的結果，並不盡然與「土著」分類模式相符，也忽略當地人的主體性與認同感。第二，它更提醒我們 Cou、Hla'alua 與 Kanakanavu 這三群彼此的社會文化特質，實際上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原住民族人、探討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研究者、關心原住民的大眾，以及博物館、原住民族和教育等行政部門等，應該都需要保持對此議題的敏感度，尊重原住民族人的主體性。

就「鄒族」族群現況來看，截至 2014 年 6 月為止，根據臺灣原住民族行政單位的民族分類，以及人類學和語言學等相關學術機構之族群分類，臺灣原住民族共分成十四族。不過，就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行政院召開正名茶會，宣布原本官方族群分類上歸屬於「鄒族」的 Hla'alua 與 Kanakanavu 這兩群人正式獲得政府認定為原住民族第十五族、第十六族，兩者的漢語族名分別為「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這是從荷蘭人開始在臺灣島上建立統治政權以來，第一次由國家認定 Hla'alua 與 Kanakanavu 具有和其他原住民族十四族同等的行政分類地位。阿里山鄒族主要聚落分布在嘉義縣阿里山鄉境內的來吉、樂野、達邦、里佳、山美、新美和茶山等七個行政村中，南投縣信義鄉的望美村也有部分族人，加上移居外地者，人口總數約七千人。Hla'alua 的主要聚落分布在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和高中里，以及那瑪夏區瑪雅里，人口大約五百人。Kanakanavu 的主要聚落集中在高雄市那瑪夏區內的兩個里——瑪雅里和達卡努瓦里，人口約五百餘人。

本書編輯過程中，感謝余萬居先生初譯，葉秀玲女士、李坤娟女士、黃淑芬女士的校譯。同時承蒙多位族人、師長、與研究生熱心協助。十分感謝鄒族汪明輝博士偕同耆老莊作合老師協助校正「阿里山蕃」的族語，拉阿魯哇族游仁貴老師協助校正「四社蕃」的族語，卡那卡那富族孔岳中老師協助校正「簡仔霧蕃」的族語發音。此外，也謝謝民族學研究所編輯黃淑芬女士協助處理繁瑣的編輯與出版事宜，王美青博士及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研究生謝欣宜與李美玲兩位同學，協助校對稿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黃樹民所長、張珣副所長以及陳文德副研究員三位師長與學術先進，促成本報告書之編譯與出版，筆者在此一併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林曜同 謹識於臺北大學
二〇一四年九月

參考書目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 小島由道
1920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 小島由道，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2001[1918]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3[1920]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小島由道、河野喜六、安原信三及小林保祥
1915-1922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 王人英
1967 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王美青
2003 文化表徵與族群性——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認同建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曜同
2005 建構與分類：「南鄒族」Kanakanavu 的族屬論述。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4:97-140。
2007 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 族群認同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2009 試論鄒族民族議會與想像共同體。刊於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明仁主編，頁 99-128。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
2010a 會所與認同之再建構：楠梓仙溪（Namasia）上游兩個原住族群之比較研究（1915-2006）。嘉義研究創刊號：103-150。
2010b 貝神祭樂舞復振與族群認同再現：以桃源鄉 Hla'alua 為中心（1993-2003）。文史臺灣學報 2:103-143。
- 芮逸夫
1972[1952] 臺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刊於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芮逸夫著，頁 523-530。臺北：藝文。
- 馬淵東一
1954 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民族學研究 18(1-2):1-11。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 陳茂泰
1993 臺灣原住民的族群標幟與政治參與。刊於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等著，頁 61-186。臺北：業強出版社。
- 鹿野忠雄
1955[1941] 臺灣土著族分類之一擬案。刊於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宋文薰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